

中國

怎么样

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张志安 叶柳◎著



ZHONGGUO ZENMOYANG

ZHUHUA WAIGUO JIZHE RUHE JIANGSHU
ZHONGGUO GUSHI



他们“妖魔化”中国了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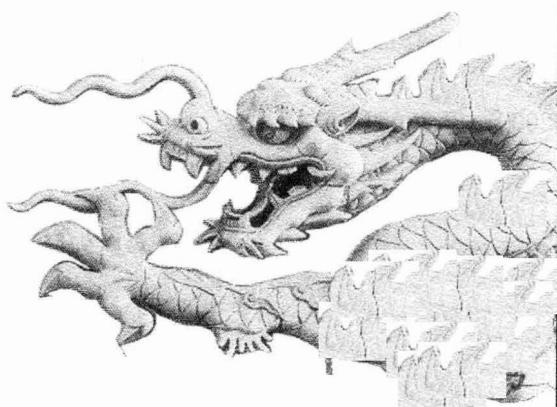
张志安 叶柳◎著

中国怎么样

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ZHONGGUO
ZENMOYANG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怎么样? : 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 张志安, 叶柳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652-920-1

I. 中… II. ①张…②叶…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510 号

本书是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项目”第三期“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子项目“外国媒体与中国形象”、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驻华外国记者的职业意识及影响因素研究”(批准号: 09CXM015) 研究成果。

中国怎么样? ——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张志安 叶柳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境外记者在中国

□ 郭 可

特殊的身份

境外记者是指国外或境外媒体机构派驻中国大陆的记者。这些境外记者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中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会）时，临时派来中国的记者，被称为“伞投式记者”；一类是常驻在中国本土的境外记者。伞投式记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一般相对较低，多数可能不会说中文。但常驻境外记者则不同，多数懂中文，且一般都来过中国，熟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还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活动力强，活动范围广，消息灵通；他们会非常重视采访实效，为了及时发出新闻，希望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不满足于一般性的采访和参观；他们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会客观报道中国情况和中国内外政策，也会渲染我国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我国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

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境外记者在中国一直属于一个特殊的记者群体。他们的身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些境外记者在华的生活圈和他们的新闻报道活动与中国同行和老百姓总有点距离。这当中既可能与中国政府新闻政策和目前新闻体制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有关。但不管如何，境外记者在中国社会中总显得有点神秘，也因此凸显其特殊性。

此外，境外记者这一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总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这或许因为他们所发布的新闻报道总与中国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某些敏感话题（如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等）联系在一起。这当中既有公正客观的报道，但也不乏在中国和中国政府看来是不客观、负面甚至恶意中伤的新闻报道。对于这些涉华负面新闻报道的诱因，中西方的专家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由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使得这些境外记者无法客观报道中国；而中国学者则认为这与境外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联。由于中西方对境外记者新闻报道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距，于是，境外记者的涉华报道已经远远超出其新闻报道的内涵，而往往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涉华国际舆论联系在一起，境外记者在中国的身

份也因此变得很不一样。

当然，境外记者身份的特殊性可能也与中国近代历史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软弱走向强大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大国的集体自信得到极大提高。而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见证人——境外记者，解读中国发展历程的心态也从原先居高临下的殖民者心态逐步变得相对多样化：有些真正看到中国的发展并为之欣喜，有些却还戴着有色眼镜来挑剔中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始终未变：境外记者一直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审视中国。这既是他们记者职业的要求，也是他们（尤其是西方记者）与中国的历史延伸。

无论是在他们的新闻报道还是私下讨论中，境外记者自己也觉得与中国国内记者不一样，或者说希望保持不一样，总用“他们”来描述中国政府、中国同行和老百姓，加固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身份。

尽管如此，过去30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对境外记者的吸引力还是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境外记者开始涌入中国。据外交部新闻司统计：1990年境外媒体在华常驻记者仅170人，全年临时来华采访的也不到1500人。2002年，常驻记者增加到353人，代表199个境外媒体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到2006年2月，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291家机构进驻中国，516名记者在华常驻。与2002年相比，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增加了93家，记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到2007年，常驻中国的境外媒体机构已上升到363家，常驻境外记者达到760名。目前，共有606名外国记者在华常驻，每年临时来华采访的外国记者有3000~5000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吸引了更多境外记者来华采访，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估计，采访北京奥运的记者人数达到了2.4万人，创历届奥运之最。^①

管制的变化

境外记者在中国的身份特殊，可能与我国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制度也有密切关联。一直以来，我国新闻管理体制总是把境外记者当作特殊对象（或另类对象）来单独管理。这不仅使政府部门和中国记者认为境外记者“与众不同”，连境外记者自己也会觉得他们很特殊。

这一点从我国颁布的三个关于境外记者的管理条例和规定可见一斑。1981年3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管理外国记者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共14条；1990年1月11日，国务院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共22条，并代替了1981年的《暂行规定》；2007年1月1日，专门针对北京奥运会，我国又颁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共9条。

^① <http://www.chinanews.com.cn/olympic/news/2008/07-29/1328608.shtml>。

1981年出台的《暂行规定》主要强调了对境外记者的限制，大多由“申请—注册—登记”的方式来体现，可以说境外记者在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管，包括入境、离境、延期、变更事宜、住宅、采访、通信设备等。1990年出台的条例则完善了相关细节，尤其是申请与注册的内容越来越细，并指定由外交部主管，在采访与通讯设备方面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并区分申请提交和获得批准两者的区别，同时对外国记者将要报道的新闻内容做了规定并突出了国家安全（第14条）。

2007年的北京奥运会规定则对境外记者采访放宽了限制，给予了很大的自由。与此前条例相比，主要在四个方面有突破：（1）境外记者采访不再需要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2）境外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3）境外记者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4）简化了相关器材入关的手续。

境外记者对我国放宽对他们采访奥运的限制是欢迎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规定可能只是暂时的。现在，中国只允许外国记者去特定城市进行采访，还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按照现有规定，地方政府有权拘留那些进行非法报道的境外记者，尤其针对政府认为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抗议示威、矿难和人权案件等。面对我国政府对境外记者的管制，境外记者的心态是复杂的，对中国政府的管制会产生一种不满。

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①2007年对163名境外记者的调查表明：47%的受访境外记者认为中国的采访环境有了改进，但67%的境外记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奥运新闻采访的承诺。该调查还罗列了他们采访中的问题，其中最大一个问题是他们无法接触到他们想见的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最高层）和公共信息服务。^②

总体来说，境外记者对中国政府目前的管理模式持复杂的感觉，既“令人失望但又值得肯定”（frustrating but positive）^③。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境外记者对政府部门会自觉不自觉地保持较高的戒心，同时也更加凸显了他们在中国作为特殊新闻从业者的地位。

报道的议题

关于境外记者涉华新闻报道的关注焦点，有一个较形象的比喻：上世纪80年

①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http://www.fccchina.org/>）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吸收在北京的境外记者为会员，目前会员已超过300人。该协会的宗旨主要是保护在京境外记者的权益并提供相关的服务。该网站上罗列了境外记者在北京采访要注意的事项，如提供主管部门的联系方式、如何保护被采访者和中国雇员。该网站记录了自他们网站开通以来283起境外记者采访受到干扰的事件。

② 在评估中国官员方面，69%的境外记者认为中国官员在接待境外记者方面做得差，22%认为中偏下，6%认为中等，1%认为中偏上。在评估公共信息服务方面，37%的境外记者认为做得差，47%认为中偏下，13%认为中等，1%认为中偏上。没有境外记者给中国官员和公共信息服务打优秀。当然，该调查并没有注明这些类别的具体定义。

③ 这是一名法国记者对目前现状的总体评价，引自<http://www.fccchina.org/>。

代，境外记者到中国后，会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到了90年代，他们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

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夸张，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境外记者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关注点。据笔者观测，过去30年中境外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开始覆盖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军事、国防、外交、体育、教育、人权、宗教等。也就是说，境外记者对中国的关注已经开始多元化。多项相关研究表明，境外媒体机构对中国报道的多元化趋势在过去10年中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关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1995年、2000年、2005年的中国报道研究表明西方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议题设置上：经济话题有了大幅增加，社会、文化领域报道增多，纯粹的政治报道比重有所下降。以经济报道为例，3家报纸2005年的报道量都比1995年提高了20%以上，基本上占了所有中国报道的1/3。因此，可以把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通常总结为五个“论”：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中国崩溃论”；三是“中国妖魔论”；四是“中国机遇论”；五是“中国发展论”。^①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境外记者的中国报道总体上还是较为客观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报告显示，美国上述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共有243篇，其中客观报道占报道总数的1/4左右，偏见报道约占1/3，平衡报道的比重是40%。因此，国务院新闻办认为：在倾向性上，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中性报道占多数，负面报道略多于正面。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占涉华报道总数的60%~70%。^②因此，可以认为在华的多数境外记者在主观上还是能用专业化的视角来报道中国的。

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境外记者对中国怀有极端的偏见。这种偏见在2008年上半年的“3·14”事件以及后来的地震报道、奥运报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片面的新闻报道与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真实报道形成了强烈反差。连西方媒体（《芝加哥论坛报》）自己都承认：“西方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寻觅丑陋东西，你总会看到一些不喜欢的东西——杂草、臭虫、野蘑菇、泥块和垃圾等。这种看法是准确的，但又是片面的，要全面了解中国需要透过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全景——专注于中国的过去并对其他事情不闻不问是一种可耻的行为。”^③

应该承认，过去30年是我国社会变化最大的30年。这一变化过程也许在西方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时期，因此客观上确实让这些不是十分了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境外记者（尽管有些记者会说中文）看得眼花缭乱，有时看不

① 《西方媒体语言折射中国形象嬗变》，引自 <http://www.sina.com.cn>，2006年11月14日，《决策》杂志。“中国发展论”为笔者所加。

② 《美国西方媒体如何写中国 妖魔化报道比例下降》，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6/30/content_4769871.htm。

③ 引自2008年8月10日《芝加哥论坛报》文章《看清楚现代化中国》，刊于2008年8月11日《环球时报》第六版。

到有些新闻事件的本质，再加上他们对中国的固定成见和中国政府本身的一些失误，使得他们的中国报道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矛盾性，较难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尽管 2008 年上半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充分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方式固定成见，但应该承认，近年来境外记者报道中国的视角也在不断变化中。微观来讲，这与境外记者的构成有关联：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记者都学习过中文，来中国考察过，比较熟悉中国的社会和事务，在处理新闻报道上更加平稳、客观和真实。从宏观来讲，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家总体实力的提高以及中国政府日益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尤其是奥运会之后），使得中国开始真正融入世界，变成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些境外记者的中国报道总体上也趋向更加全面、相对客观。

舆论的焦点

当然，境外记者在中国之所以变得很特殊，除了上述分析的一些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中国新闻报道老是在主导着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国际媒体）涉华国际舆论的走向。可以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媒体中涉华国际舆论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重大国事，而且一般总是对中国不利的影响。2008 年上半年系列事件的国际舆论可以说是把这种影响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次国际涉华舆论不仅绷紧了中国的政治神经，还激怒了中国一般民众，使得境外记者的新闻报道演变成中国社会和民意与国际媒体（甚至西方国家）之间直接对抗的导火线。

于是，在中国的境外记者以及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否公正、平衡和准确一直是中外争论的焦点。但事实已证明：这一问题可能比涉华国际舆论本身更为复杂。中方会认为国际媒体中的涉华舆论大部分报道是负面的，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没有反映中国全貌；并认为境外记者的这些负面涉华报道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境外记者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或是为了迎合一些国际媒体总部编辑或政府和财团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市场因素的影响以及他们片面追求戏剧性效果。而境外记者则会认为中国人高估了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记者，不是他们国家或政府或新闻机构的代表或发言人，他们报道本国政府可能也以负面为主。作为记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尽量客观地报道中国发生的事件，而且他们有时之所以不能客观和准确地报道中国，是因为缺乏中国政府的有效合作，有时甚至是故意妨碍和干扰。境外记者认为中国不应单纯用“正面”或“负面”来考虑问题，也不能仅仅以“中国的敌人”或者“中国的朋友”来判断一名境外记者。

总之，中外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中方认为媒体（或新闻报道）的责任，是要营造良好的涉华国际舆论，而多数境外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则认为媒体应是寻求真相的独立声音。这几乎使双方无法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无法找到简单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①

结 语

境外记者与中国社会之间对媒体功能和舆论的截然不同态度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要消除双方的误解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从目前而言，境外记者和中国（包括整个社会和政府部门）可能都把对方看成“他们”，与对方打交道都会理解为“与狼共舞”，都会对对方抱有戒心。显然，这样不利于增强双方的相互理解。但是有一点可以预测，将来某一天当境外记者在中国不再显得那么特殊之时，当政府无须颁布特别条例来管制境外记者之时，境外记者这一名称可能会慢慢消失，至少会变得不那么特殊了，中外在新闻传播和媒体的理解就会大幅增强。

也许这只是一种假设。但 2008 年奥运会开始以来，从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和开放自信以及境外记者和国际媒体的奥运报道来看，这种假设的实现应该是有可能的。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本书策划）

① 以上一些观点主要引自特里萨·J. 劳森 1998 年撰写的《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大会总结报告》以及中外记者在北京开展的两次对话的综合。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	001
----------------	-----

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

——CNN 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Jaime A. FlorCruz）访谈 ... 001

（20 世纪）80 年代在中国当记者，又简单又困难/可以批评你，但也给你说话的机会/我们要所谓的“容忍不完美”/中国是幅马赛克，只能片片贴出来

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林洸耀（Benjamin Lim）访谈 011

尽量去反映“故事的双方”/作为外媒来说，批评是必需的/中国故事不再单一，而是越来越多元/在中国，记者必须懂得如何做人/我们没有义务去教育老百姓

我感兴趣于中国现实中的张力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 Edward Cody 访谈 021

最困难的是和最近的新闻更新保持同步/专业记者要有不受干扰的能力/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是两个体系

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舍赫鲁尔访谈 028

半岛电视台就像是孤立的自由岛/西方媒体所说的媒体自由是一句空话/不是在半岛工作，而是为半岛工作/用阿拉伯自己的眼睛看中国

神秘的中国适合写侦探小说

——《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访谈

..... 041

要看到经济数字背后的力量博弈/我不相信什么“客观”的说法/如果可能，最想做中国共产党的报道

中国的故事在于变化与运动

——英国《卫报》北京社社长华衷（John Watts）访谈 …… 050

我心中的中国形象每几天就变化一次/在中国，很难听到故事的正反两面/如果可以选择，我只做深度报道/我们不可能总是看到全部的真相/没有人可以报道中国的全部

有意思的中国故事很难写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盐泽英一访谈 …………… 064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来自一个人的消息源是不准确的/日本媒体界曾经是左派的摇篮/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红包

不喜欢从慕尼黑来判断中国的感觉

——《南德意志报》驻华首席记者包克（Von Henrik Bork）访谈
…………… 074

我并不是要说中国坏话的记者/选题的判断标准就是“厨房喊”/我不可能给你提供全面的中国/没办法完全客观，但起码要尽量

以理解的心态去看待中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访谈
…………… 085

新闻无可避免地要受价值体系影响/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认知可能是片面的/踩着学者的肩膀去看中国/我不觉得，解读事实是记者的责任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越南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阮春正访谈 …………… 094

我们不关注负面消息/什么问题对人民有益，我们就关注/人民最高的代表就是劳动人民的利益

好记者应该尽量地接近公正

——《纽约日报》亚洲部负责人葛根（Edward A. Gargan）访谈

..... 103

知道过去才能更好地去写现在/我感兴趣的是处于某个文化系统中的人/不管简单或复杂，都需要分辨不同的信息/记者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给所有当事人说话的机会

——路透社北京分社高级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访谈 ... 112

如果故事讲不好，谁听谁看呢/我是心里有数了才去写的/中国怎么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

寻找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故事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京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访谈

..... 120

因为没在这里采访过，所以想来中国/在中国，很难找到政府官员发表的评论/我对农村问题更感兴趣

以话筒作笔描摹万象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驻中国记者孔安（Anthony Kuhn）访谈

..... 127

外国媒体写中国，只写了一个轮廓/体察和反映民情是我们的天职/中国最有意思的是观念、文化和思想上的变化

无所谓新闻正负，只在乎报道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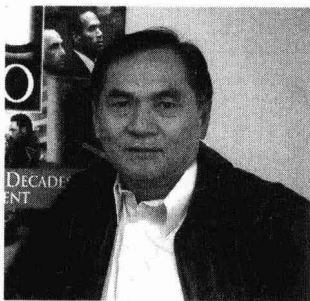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林夕（Lindsey Hilsum）访谈 138

对新闻记者来说，中国太难把握/挑战在于看到事件之外的东西/记者的专业素质是不会因地制宜的

后记 148

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

——CNN 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 (Jaime A. FlorCruz) 访谈



个人简介

吉米 (Jaime A. FlorCruz) 1951 年 4 月 5 日生于菲律宾。在菲律宾上大学期间，他是一位激进的反马科斯政权分子。1971 年 8 月，吉米来到中国进行一个为期三周的旅行，却意外地被困在这异国他乡，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1972 年，马科斯宣布进行军阀统治，一年后，吉米的菲律宾护照过期。此后，他困于中国长达 12 年之久。

在华期间，吉米不仅学习、工作，还周游各方。1972 年，他在湖南省的一个国营农场劳动了将近一年，后来又 to 山东省的一个渔业公司工作 (1972 ~ 1973 年)。到北京后，他在北京语言学院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前身) 系统地进修了两年中文 (普通话)，还参加了翻译培训。1982 年，他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史的学士学位。此前，他曾于 1971 年在菲律宾理工大学获得广告学学士学位。

吉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研究了中国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写论文期间，他还担任了美国《新闻周刊》的新闻助理 (1980 ~ 1981 年)。1978 年，吉米每周给北京大学的老师进行两次英文培训，后来又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培训英文 (1979 ~ 1981 年)。他还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个名为《大家一起唱》的栏目里教英文歌曲，并且有过几次上镜的经历。

1982 年，吉米加盟了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中国记者站，并在 1990 ~ 2000 年期间担任其首席记者。2000 ~ 2001 年，他在纽约获得了爱德华·默罗新闻基金会 (Edward R. Murrow) 的研究基金，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新闻研究员。吉米于 2001 年 7 月加盟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目前担任 CNN 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在 1988 ~ 1990 年，以及 1996 ~ 1999 年期间，他曾两次担任“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大概有 200 多位成员。

吉米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菲律宾语以及中文 (普通话)。

访谈实录

访谈时间：2008年1月30日上午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当记者， 又简单又困难

问：您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了，又是亚洲人的面孔，把您看成外国记者，我们都觉得有点别扭。您自己也会有跟其他外国同行不一样的心理感受和身份认同么？如果有，这种不同主要是什么？

答：我想主要是有对比的好处和机会。我最早从1982年开始在《时代》周刊工作，那时候，当记者是又简单又困难。简单是因为可做的东西很有限，中国当时的体制、政策对外国记者限制很大，采访的机会特别少，能做的报道也少。主要是因为社会本身，体制的控制是很严格的，很难交朋友，官员和老百姓都很避讳我们外国记者，住、行也都有限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都是指定的，出去行动和采访也很有限，一般都得有指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们去。要去外地采访得特殊申请，批准了，才能去，而且一般都是集体出去、集体采访。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到比较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

问：能出北京都这么不容易？

答：对，包括几年以后，大概1988或1989年，组织我们去西藏，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说简单，也是因为当时外国记者团特少，十几个媒体，可能还不到100个记者。一方面，我们都很团结，谁都认识谁，而且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另一方面，我们又都觉得困在一个地方，信息很少。那时候，除了官方的消息来源以外，很少能得到非正式的或者通过私人关系获取所谓的“小道消息”，能够抢到一些新闻也是很大的事。

问：80年代，你们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在规定范围内有限地做报道。当时，对中国的报道恐怕不是非常负面吧？

答：不是。它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那时候，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不都是特别负面的，甚至是浪漫化的——把中国浪漫化。尤其80年代初，很多记者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学过中文或中国学，但对中国不够了解，最早的一些报道写的是新鲜或浪漫的中国故事。后来开始有一些负面报道，因为很多人开始敢跟外国记者接触，传递一些信息，发表一些意见，才开始有那种负面报道的叙事吧。

那个时候，最早的报道主题、文章是关于北京烤鸭或者中国熊猫的，还有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等等，都是很好奇、很稀奇的东西。另外，很多报道都是有关政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或者政治斗争、权力之争，这类文章中分析报道比较多。有个说法叫“tea leaf reading”（茶叶占卦），就好像看茶叶来推测一些事情，“reading tea leave”的意思就是通过看茶叶能得到什么提示，判断会有什么结果。把它比喻成这样，是因为关于中国的政局，我们能知道的或能琢磨透的很少，只能猜测、推测。有一些所谓分析家，就凭着谁跟毛主席或当时的领导人坐得近来推测谁的官职会上升，从70年中后期一直到80年代初，都是这样。

问：80年代，兴起全民文化热，西方哲学等思想涌进中国，个体意识解放、社会观念逐渐多元化，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报道的主题是不是也逐渐多元化？

答：我想是多元化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了一定深度，针对一些具体话题，我们开始有比较深度的接触。

问：采访限制上，会不会也有所变化？

答：逐步有一些变化，不过还是很初步。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还算是比较开放的，主张透明度，在媒体上也有所反应。当时很活跃，包括媒体也很活跃。

问：1987年是所谓的“深度报道年”，《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做了很多改革人物的报道，发表了很多深度报道。

答：很多长篇报道。外国媒体也同样受到了一些启发，接触到比较广的信息，从主题来讲，从深度来讲，当时的气氛还比较宽松。

问：当时，您在什么媒体工作？

答：还在《时代》周刊工作。有一次，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搞活动，我也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高级领导人比较自在轻松的样子。会场的气氛也比较轻松，做外国记者工作的人好像也比较主动地给我们介绍情况。当时的中国记者协会也比较活跃，有一帮比较年轻的人，比较开放，组织了一些发布会和参观活动。

大概25年以前，外交部第一次开始搞发布会，钱其琛是新闻司的司长。当时，大概每个月一次或两星期一次，很简单，也就是在国际俱乐部这个地方，上面有个小电影厅，我们几十个外国记者就在那儿听。一般他们就念念稿子，20分钟左右，最早的情况是发布完就结束，不回答问题。

2000年，我离开过中国一年，在那之前，可以做的东西也多了，可报道的题目也多了，我们当时关心的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中国的媒体也更活跃、更多元了，消息来源比较多。不过，关于正面、负面的比例很难分清，应该算比



较平衡吧。

可以批评你，但也给你说话的机会

问：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著）一书，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您对此也有所关注吧？

答：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也关注到这种言论比较多。我觉得是个理念问题，能不能判断外国记者有意识地找中国的茬，还是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和现象？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型论坛，大家都觉得，我们外国记者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公关公司，没有义务替某个国家辩论，但这个不等于“妖魔化”中国。说一些负面的意见，写一些不好听的文章，也不等于“妖魔化”。我们没有义务关心或者考虑两国关系是否会因为我们的文章而受到影响。

问：那个时候，这种讨论有结果么？

答：我觉得没有很明确的结果，但现在，这种“妖魔化”的理念已经被逐步改变，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在慢慢接受我们的想法。

问：你们的讨论还是小范围内的，普通老百姓恐怕很难知道。您觉得，近年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何变化？

答：虽然也还有些限制，但近几年形式上的变化比较明显。发布会肯定比过去密集多了，老百姓也比较愿意接受采访了，交朋友比较容易了，建立信任以后也很愿意讲。报道的主题、内容也多元化了，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出去采访了，不一定限于北京或上海，很多记者到全国各地去捕捉新闻，把各地一些故事讲出来。

问：嗯，报道的密度更加集中、题材更加多元，关注政治之外也非常关注经济、环保、农村等。但是，好像有两点没有根本性改变：一是依然以报道发展中呈现的矛盾、问题、缺陷为主，二是依然将很多议题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挂钩。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受？

答：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是正常的，没什么新鲜的，新闻强调反常，下意识地会反映出这种形象。我觉得，关键在于报道本身是不是平衡和公正，是不是能讲出负面和正面的东西，在一篇文章中能不能反映出两方面的看法和声音，我没做过很系统的分析。

作为一个记者，这种精神、理念是总的目标。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是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可能有些报道负面的东西比较多，或者专门找一些中国的问题来报道，但他们在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

问：从单篇报道来讲，能够做到客观和准确，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报道会让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形成偏见或某种刻板印象，很难建立真正全面、完整的图景。如果希望外国记者在“微观真实”基础上去做到“宏观真实”，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答：太高了。我们以前的问题是，你想写个报道，讲一些问题，你的报道可能被认为是负面的，按理说应该把另一方的立场、声音发出来，但那往往是政府的看法，但政府的声音往往发不出来，因为政府不想说，甚至不给你回电话。所以，过去的问题往往出在这儿。我们也给中方官员说过这些，这些年，一直跟他们说，建议他们最好主动地发出声音。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他们已经开始做了。他们也意识到，“我们不能等”。你不能告诉我“明天答复你”，新闻要快。你今天不答复我，那你就放弃了，你就算弃权了。比如，关于布托被刺杀^①，我想让中方（比如新闻司）给些反馈，这个不算负面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答应给我们 15 分钟的专访时间，单独过去就开始拍。可见，他们已经开始掌握这个道理，更及时、更快地发布消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批评你，但我们也愿意给你说话的机会。

问：您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可能很复杂，这个跟您的个人经历或许有关系。不知道，您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答：30 多年来，的确有很多变化。

问：当时作为青年代表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带着很多浪漫的憧憬？

答：是的。我也会看到中国很多的问题，但我能欣赏很多的小变化。一些小变化、小提高，在外国人眼里算不了什么大事，尤其在他们的国家是小事，但对我来讲，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就能欣赏近几年的小小变化。而且，我知道来得不容易，也还可能会倒回去。所以，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我是深有体会的。

问：有很多外国记者来华驻站一两年就回国了，或者轮值三四年就走了，他们的确很容易拿自己国家作为参照，以此来反观中国，会觉得很多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里变成了不可思议，违背了某些常识，自然会有质疑和批判的倾向。而您这么多年来在中国生活，自然会有一种本土的、历史的比较意识。

答：看怎么衡量，这是 glass, half full（一个杯子，一半满）。我觉得，一半是满了，因为我看过它曾经空空的样子，但很多外国记者看，还空了一半。

问：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您对中国感情有什么变化呢？

^① 2007 年 12 月 27 日下午，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该国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参加集会遭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亡，终年 54 岁。